

清代西方人視野中的澳門與廣州

耿昇*

澳門在17-19世紀的中西關係史中，佔據着重要的地位。它是西方來華的商人、傳教士、外交官、旅行家們的一個重要中轉站，也是西人進入中國內地之前的橋頭堡和“培訓中心”。中文史料中對此有大量記載，近幾年來都陸續輯錄刊佈。西文史料中的記載也很豐富，其中某些重要的記實和論述作品也都已翻譯出版。本文僅就某些不大為國內學術界所熟悉的17-19世紀西人對澳門與廣州的記述略作引介，或可使人更加清楚地看到，澳門以及與它密不可分的廣州，在早期中西關係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雖然這些記載顯得零碎而散亂，但它們都是記實性的著述，完全可以為深入而系統的研究提供第一手的翔實資料。這些資料又不曾見諸中國的官方文獻。透過現象，看到本質；通過微觀，看到宏觀；通過它山之石，可以看到中國當時的國情。——這正是我們的研究所需要的親歷性資料。

傑梅利-卡雷里對澳門和廣州新年的記述

意大利那不勒斯人傑梅利-卡雷里（Giovanni Francesco Gemelli Careri, 1651-1725）是第一位進入中國的西方世俗旅行家，出生於意大利的一家名門望族。他在32歲之前就接受過良好的科學和文學培養。此人從40歲開始先後遊歷歐洲諸多國家之後，於1693年耗盡其家庭的全部資產（數量鉅大），又乘船東行，意欲遠遊抵中國。他駛抵印度後，曾受到大莫臥兒王朝國王的接待，然後從果阿直航澳門，1695年到澳門。他再從澳門出發，在耶穌會士們的幫助下進京入宮，受到清聖祖康熙皇帝的召見。傑梅利-卡雷里於1696年返回澳門，後又乘船赴墨西哥。他出版了六卷本的《環球旅行記》（1699-1700），其中第四卷為《中國遊記》，於1727年由埃狄納·卡諾（Etienne Canneau）推出法文版。從中世紀直到中國於19世紀對外開放，此人是惟一的一位既非傳教士又非政府使團成員的入華西人，而且是成功地從澳門直達北京的旅行家。

傑梅利-卡雷里在澳門與廣州居住期間，對當地作了詳細描述。他在這兩地停留時，正逢中國的傳統新年——春節。他在澳門看了一場中國戲劇表演，這是由坊間聯合起來自費排演的，在一個小廣場中央表演，舞臺相當寬大，可以容納三十多人。作者對該戲劇情節一竅不通，因為演員的道白使用官話，但他通過演員們身勢手姿的傳神演技，還可判斷其表演精彩之處。戲劇中唱白相雜，由多種銅木樂器伴奏。戲裝乾淨鑲上金箔飾物，演員換裝頻繁，一場戲往往持續十個小時以上，以燭光而告結束。散場後，演員與觀眾們才去進餐。

傑梅利-卡雷里於1696年2月3日，在廣州和澳門度過了中國傳統的春節。這兩天傳教士們也特許中國天主教徒們吃肉，因為他們自己也開戒大啃大嚼。這項特許又成了澳門主教與法國宗座代牧之間的一場新爭執的焦點。傑梅利-卡雷里於此期間，在廣州和澳門散步，發現這兩地裝飾得很美，人們處處沉浸在一片節日的歡樂氣氛中。衙門都關閉了，陞堂沒有定時，甚至沒有定日，官員們將大印封

* 耿昇（1944-），1968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現任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會長。他是法國文學藝術勳章獲得者，長期從事中法關係史和西域史的研究與翻譯工作。

起，以便安心過節。由朝中的星相術士們確定每個新年開始的時辰，為了使皇帝年號在來年呈現吉祥幸運。1696年1月22日下午兩點鐘左右，全城封印關衙。由於那幾天沒有任何案件審判，那些毛賊盜寇們紛紛出動，他們自信不會當場被捕受懲罰。這幾天行人反而老是處於非常緊張危險的境地。衙役們加倍防守，以期在重新陞堂時嚴厲懲辦罪犯。最貧窮的人也要在新年佳節購置一件新衣服，用新紙裱糊房間的窗戶和牆壁，重寫楹聯，籌辦年貨，以備與親朋聚會。春節之夜，全城燈火輝煌。

除夕之夜，澳粵兩地都在積極準備辭舊迎新。人們分開父子長幼依禮叩頭。在父親要求兒子們這樣作時，他們必須先向自己的父母和先祖磕頭。整夜便這樣吃喝玩樂，甚至連女子們也破例這樣做。

春節期間，那些篤信宗教的虔誠之士，都在天亮前趕往佛塔寺廟，到那裡祈禱磕頭、上供焚香。親戚朋友們相見也必須喝三杯米酒，以示賀歲。人們往往都是衣冠楚楚儀態端莊地出行，回來時卻頭重腳輕狼狽不堪。中國人在春節一般都保持矜持，如果要說笑哭鬧或作出某種詼諧的動作，那麼這一切對來年都會是凶兆。澳粵兩地到處都聽見中國鑼鼓和其他樂器的演奏聲音，還可以看到煙花。廣東人過年要化費大量銀子鈔票。他們購買許多肉禽水菓，到寺廟供奉祭祀之後，帶回家中自己享用。

過完春節後，傑梅利-卡雷里一行又與中國人一道歡度元宵節或稱花燈節。在澳粵的每個居民區，都有幾尊人物造像，圍繞着它們又有多名戴假面具演奏各種樂器的人簇擁着。前面是一支長長的用高杆挑着燈籠的隊伍。燈籠用彩綢或彩紙製作，分別呈魚、犬、馬、獅和其它形形色色的動物形狀。貧苦人家的燈籠價值15-20文；總督與達官顯貴人家的燈籠貴達100-200文，甚至有300文的，其長達20-30隻手臂之長。

作者認為，他不相信世界上還有其他國家的煙火藝術可以攀比中國人的水平。人們可以看到一整串紅葡萄起火卻不會被焚燒；葡萄樹的枝杈、葉子、葡萄串顆粒都逐漸燃燒起來了，映出了它們各自的彩色。

總而言之，中華帝國在春節期間的開銷多達數百萬元。此外，還有無數用來裝飾、焚燒、製造燈籠和煙花的紙張。中國所有的城市、農村、山丘與江河，全被映照得紅通通亮晃晃。

傑梅利-卡雷里一行在澳門停留了一段時間之後，決定進京入宮朝聖。他們便請求葡萄牙將軍設法謀求中國戶部的一份護照，以便安全上路。將軍答應後，他們又找到一名中國人充當沿途的翻譯。這一切都順利地辦好了，而且費用非常低廉。在他們尚未從澳門出發之前，澳門方面已經將該城官吏們的上表呈奏皇帝，其中涉及歐洲“獅子號”船已駛抵本港口一事。戶部（粵海關）代表對於這一切辦得很隆重。戶部代表來到大庭廣眾之中，坐在一把交椅上，面前擺好了一張用絲綢覆蓋的案子。他身穿長袍，上身的披肩於兩側各形成一翼。在座的人聽到多種樂器演奏，加上混亂的歡呼聲。那裡放了三聲禮炮，排成一列的三十名兵勇打着不同形狀的旗幟，還撐着一頂碩大的華蓋。戶部代表跪在供奉盛放上呈皇帝奏折錦囊的案前。戶部代表三次以頭叩地，然後又站了起來。那些演奏樂器的人和撐華蓋的人都退出去了，以便人們得以依禮規將錦囊封口。驛使聽到三聲炮響後，便接起它立即騎馬開始馳騁。每個官吏都必須向驛使提供最好的馬匹上路，不能有絲毫怠慢。官吏隨後坐了下來，打開儀式舉行期間關閉的房門。

傑梅利-卡雷里必須穿着中國服飾，才能獲得沿途的關文。當他到達廣州時，在耶穌會士和其他傳教士之間，正爆發一場嚴重衝突。因此，所有人都誤認為他是教皇派遣的，會秘密地向教皇通報資訊。有人把他當成了主張赤腳穿皮鞋的支持德肋撒改革的加爾默羅派會士，其他人則認為他是俗間司鐸。儘管他作出很大努力，以使人們相信他是那不勒斯人，完全是為了滿足個人的好奇心才赴華旅行的，他並不想打聽傳教區的事務。因為自從中國的道路開通以來，那裡尚未見過世俗意大利人，更不曾見過那不勒斯人。他讓人搜查行李，看是否有教廷的指令。耶穌會士和方濟各會士們都在探聽他到達澳門和廣州的真正目的。

由於傑梅利-卡雷里要赴北京，所以他向自己居住的修院院長請求給他派遣一名嚮導。他這次赴京之行，更增加了身處澳粵兩地的傳教士們的懷疑，最終使他們相信他是教皇派來的人，以解決他們之間的糾紛。總之，人們都懷疑他是一名“間諜”，尤其是當時的葡萄牙人特別反對任何歐洲人不經他們同意而擅自進京入宮。修院院長選擇了一名中國基督徒作嚮導，神父們都為此人的忠誠作保。他們就這樣或乘船或坐轎一直去到北京。

傑梅利-卡雷里對於澳粵春節慶賀活動的記載，與現今北京的盛況基本上沒有多大區別。

英國青年貴族威廉·希基 對廣州的一次中英衝突事件的記載

一名原籍為愛爾蘭的富裕官吏的第八子威廉·希基 (William Hickey, 1749-1830)，從很年輕的时代起，便過着一種放蕩的生活，甚至一天發展到了挪用父親部門的資金以滿足其喜好賭博與享樂生活的地步。他被人稱為英國的“青年貴族”。其父對兒子的越軌行為厭煩至極，便強迫他從事一次遠航，令其去印度和廣州。希基在 19 歲時乘東印度公司的普拉塞號 (Plassey) 航船出發赴印度的馬德拉斯 (Madras)，其父強迫這個行為不端的逆子加入那裡的一家公司。但“青年貴族”不具備規規矩矩生活的素質，當他要回程時，卻在返英和逗留廣州之間猶豫不決。他後來毅然決定遠涉中國，就於 1768 年到達廣州。他的四卷本巨著《回憶錄》自 1919 年起才由斯賓塞 (A. Spencer) 在倫敦陸續出版，後由布思羅伊德 (N. Boothroyd) 譯為法文。其中有關中英在廣東的衝突、廣州的“抓扒手”遊戲、廣州的娛樂業、中國人的技巧以及在廣州城的遊覽諸多記載，甚為詳細。本文將簡單介紹一下有關中英之間一次具體衝突的記載。

1768 年 9 月，格蘭比號 (Granby，即那艘因迷失方向而被宣佈“丟失”的船) 逆黃埔江而上，裝載滿船財寶欲駛達廣州港。該船駛經粵海關門前時不肯接受檢查。中國官吏們便追趕該船，在追上它之

後，強令它折回海關。中國海關下達這道命令的方式惹怒了英國海員，他們拒絕服從。中國人於是便試圖強迫他們執行命令。這些中國人被拋入水中，並遭到英國人約翰·布林 (John Bull) 的拳打腳踢。在打鬥中一個中國人被淹死。這一事件使全城群情沸騰，民心激昂。官吏們四出活動，全部貿易暫停，向外船提供的日常給養也一下告罄，下令全體英國船員投案自首，由中國當局審判“兇手”。大班們拒絕服從中國當局的命令，強調滿載財寶的船舶，根據現行在類似情況下的特權，不應該受檢查。他們還聲稱在經過粵海關時，曾申報過其船艙中貨物的性質。雙方各持己見，而且這樣一種僵硬態度的後果必定會很嚴重。大班們於是提出了一種妥協的解決辦法，終於被雙方接受了：格蘭比號船及其船員被繫泊在夷館的階梯前，一直到東印度公司一個人完成這次公正的調查為止。

當檢查正在進行期間，船員們滯留在廣州的船上，燃起不同顏色的小蠟燭，飲酒和唱海員歌曲消遣。他們言談間那異想天開的口脛和談話內容，使大班們頗感興趣，因此這些在他們頭頂上船廊席地而坐或散步的海員被邀共飲。一天夜間，德維斯姆 (Devisme) 先生發現有三、四名船員爛醉如泥，僅僅是為了睡覺才回船艙。於是他便責備這些隨意走出船艙的人，提醒他們如此酗酒，夜間的潮冷氣候將有害於身體健康。這些建議卻遭到諷刺和謾罵。但此後幾天共有八人突然死亡。船組人員懷疑有人投毒。在黃埔江上發生的這一樁事件，激起船上的官兵奪取武器，向廣州城射擊，意圖為其同伴的死亡報仇。祇有當兩名船長以其人格發誓將對這些事件進行調查並將向船組所有成員通報時，騷亂最終平息下來。大班們立即召集居住在廣州的所有歐洲外科醫生，並當着眾人的面對最早死亡的三人作屍體解剖。經過最仔細的檢查和研究之後，外科醫生們一致認為，死者沒有任何被毒殺的跡象，這些人祇是由於夜間受涼和呼吸有害空氣才死亡的。對其他五名死亡者的診斷結果也大同小異。經過這些調查之後，中國一方也感到滿意，於是便放棄了他們要進行司法追究的威脅，一切似乎又都恢復了正常狀態。

然而，八個人的死亡，使船長斯莫爾伍德（Smallwood）變得非常憤怒和消沉。儘管出具了這些醫檢報告，但他仍堅持認為這些人是被毒殺的，甚至且還疑惑自己將成為當地居民的迫害對象。大班們和夷館醫生戈登（Goldon），都試圖使這個不幸的人消除其神經過敏，但未獲成功，船長終因鬱憤而死亡。

當所有這些事件造成的驚訝稍為平息之後，又發生了一件其後果雖不太嚴重卻也很煩人的事。有人給公行（Cohang）發來了一道命令，斷然

停止為所有夷船裝艙，因為其中一名船長埃爾芬斯通（Elphinstone）非法地將一個女子帶到廣州。事實上她是馬德拉斯（Madras）的一名少女，極其聰慧。當船長在印度的聖喬治堡（Fort St. George）時迷戀上她，把她化裝成男青年帶來廣州夷館。這個少女或是被中國人識破，或是被僕人出賣，最終被抓獲並被押解到澳門監獄。埃爾芬斯通船長清楚地知道，在此情況下中國人的惟一目的便是向他敲詐一大筆罰款，他沒有任何辦法逃避，祇好答應付款。



夏爾·德·貢斯當

當一次犯罪事件被公開時，中國當局便會立即中斷與歐洲人的一切交易，一直到真正的或假想中的罪犯交納罰金為止。中國人為了加強他們的控制，他們為每艘外國船指定一名“買辦”，負責提供船隻的日常給養，這成為一項收益可觀的職務。官府首先與他打交道，他或者是直接交納罰款，或者是失去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如果罰款數額特大的話）。船長這次被迫支付500個大洋。

總而言之，英國青年貴族威廉·希基對廣州一次中英衝突事件的記述，使人多少瞭解了那個時代中西貿易中存在的重重困難。

夏爾·貢斯當有關18世紀 廣州與澳門對外貿易的記述

貢斯當 (Charles de Constant) 1762 年生於瑞士的日內瓦，1835 年在一次旅行中於英倫三島的倫敦去世。貢斯當家族是法國 17-18 世紀的一個名門望族。該家族原籍法國利斯河畔的奈爾 (Aire-Sur-La-Lys)。它始終與歐洲 16 世紀的宗教改革休戚相關，曾獲得奈爾附近的利伯克 (Rebecques) 男爵領地，但特魯宛的主教於 16 世紀末剝奪了貢斯當家庭對該領地的擁有權和繼承權。貢斯當家庭的安東尼 (Antoine) 之子奧古斯丁 (Augustin, 1535 或 1540-1593) 經里昂遠徙日內瓦，最後定居洛桑。由於他們失去了祖傳的土地，該家族就毅然轉向經商，主要經營絲綢與香料。該家族從第四代起，便有不少成員轉向文學與科學事業。夏爾·德·貢斯當的父親是瑞士軍官，從此行伍也成為該家族的傳統職業之一。其弟本傑明·貢斯當 (Henri 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0) 是當時法國的著名作家和政治家，法國大革命時，因受斯塔爾夫的影響而投身革命派陣營，後又反對拿破崙。當他流亡德國時，曾與文學家、思想家和狂飈運動的代表人物歌德、德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席勒等人交往甚篤。1830 年 7 月，他出任法國革命後的立法委員會主席。其名著《阿道爾夫》(1816) 首開現代心理小說之先河；其五卷本的《論宗教的起源、形式及發展》(1823-1831) 是對宗教情感作歷史分析的代表作。貢斯當在年幼時，便先後在荷蘭、瑞士、英國等地求學深造。但由於其弟本傑明·貢斯當聲名赫赫，使兄長終生處於弟弟的陰影之下與保護之中，反而被埋沒了應得的名聲。貢斯當似乎從來不喜歡其家庭祖傳的兵戎生涯，而更喜歡漂泊於海外從事貿易商務。他遠赴海外，當然既有個人的興趣，也是為圓其發財致富的美夢。他於 1779 年 16 歲時入華，曾三次長期居住在中國廣州，搜集資料，以圖打破由耶穌會士們描述的那種田園詩般純樸而又美好的中國形象。他的所作所為，又證明了西方漢學界有關中國

18 世紀兩種中國形象的觀點：商人和旅行家的中國負面形象與傳教士們的中國正面形象，因為前者看重於賺錢，後者側重於文化。

貢斯當 1779-1793 年間，前後三次來到中國。第三次在華停留三年又三個月，其第一次入華停留了二十九個月，第二次在廣州也停留了三十個月。這樣，他終生在中國共停留了八年零兩個月時間，正值其青春年代。

貢斯當的著作手稿，現收藏於日內瓦圖書館，係厚厚的由數千頁組成的一部著作。其中有許多來往書信，不少出自其弟本傑明之手，事實都在說明他也是具有同時代人將一切都記載下來的情趣。他的確是具有好奇思想的一名卓越的觀察家。在他的諸多遺著中，《中國 18 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回憶錄》是最重要的一部，於 1964 年由德爾米尼 (Louis Dermigny) 先生整理出版。本文僅對其有關澳門的記述略作介紹。

常駐廣州的歐洲人一般都習慣於到澳門去住冬，因為他們喜歡這個具有某種南歐色彩的地區，而且進出也不需要任何申請和批准。駐廣州的歐洲人被迫每年到澳門定居半年，他們在澳門租用及修繕非常豪華的住宅，喜歡選擇宅地美觀且帶有很大的美麗花園。自 16 世紀以來，葡萄牙人便習慣於將莫桑比克的黑奴販運到澳門，為到那裡住冬的駐穗歐洲人充當僕人，特別是做轎伕。澳門的西洋轎子有五名轎伕，由四個人抬轎，一個人撐陽傘。

澳門半島由一條長半法里和寬 0.125 法里的狹長地帶與陸地相連。中國人曾在那裡建築了約 15 法呎高的寬厚城牆。城牆中央是一座酷似城門的大門，駐紮着一支衛隊，由十名兵勇負責阻止中國人經過。在澳門需要記住的第一個詞是 Maetti，即媽祖。澳門全民信仰著名偶像媽祖，在那裡的山上建有媽祖廟。另一個詞是“馬交港”(Ama-cao, Guad)，即今天的“澳門”，意為“打開門或進口”。

澳門除了某些海灘之外，在大海一側有乾旱的山嶺環繞着，由岩石堆積起來的山崖所組成，其周長為 10 海里 (nautical mile，每海里約為 1852m)，城市佔據了這片領土的三分之一。在丘陵之中有一

片由中國人辛勤耕耘的土地，那裡很容易引水灌溉和蓄水。當地中國耕農已從極端懶惰的葡萄牙人手中奪回了該地區的土地，他們居住在這片富裕平原的四個村莊：Mong-ha（望廈）、Patane（沙梨頭）、Saint-Lourenço（聖老楞佐）、Monchêon（？）。該島的未耕耘部分被闢為中國人的墓地。世人從未見過如此遼闊和具有如此之巨型墓碑的墓葬地。城市的佈局很美觀，每側均以階梯狀上昇到多座丘陵，其中的某些山頂由炮臺和教堂佔據。澳門共有十三座天主教堂、三座男子修道院、一座烏爾蘇拉修會（Ursuline）或聖克雷爾（Sainte-Claire）修會的修女教堂。大部分教堂都很龐大，建造得很漂亮。屬於耶穌會士們的大三巴（聖保祿教堂，Saint-Paul）具有九根廊柱的漂亮門面。它們均佔據了最美好的地段及最佳方位。

澳門城由一個要塞工事或一個城堡所保護，城外有一座佔據着一座山丘之最高峰的炮臺，它俯瞰全城和大海，這就是東望洋炮臺（Fort de la Guia）和三巴門大炮臺（La Citadelle de la Montée）。在海港進口處有一座大炮臺，船舶必須在炮口監視下駛離。在最容易看到大海深處的地方，還有其它幾座炮臺，這些炮臺均配備 150 門鑄炮，然而炮架的現狀非常糟糕，城牆的保存狀態也很差勁，人們很少會對它們加以修繕。當時駐澳門的葡萄牙兵營擁有 150 人，由不同民族和不同膚色的人組成，中國人不允許葡人增加駐兵人數。就這塊殖民地的現狀而言，它很容易被奪取，若有一支 500 人的歐洲人駐軍，並且處於警備狀態，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抵抗中國的任何軍事行動。如果葡軍能保持與海洋的自由交通，那就更輕而易舉了。澳門城在陸地一側由高大寬厚的城牆環繞，係由葡萄牙人在一百多年之前當荷蘭人企圖奪取該城時抓獲的荷蘭俘虜修築的。城外還有一家醫院和一座孤兒院。

當地的葡萄牙政府掌握在一個議事局的手中，也就是澳門市政廳。它原來祇接受開赴日本的遠征艦隊司令官定期的巡視。從 1623 年起，又從中加入由果阿總督任命的一個“兵頭”。議事局由印度的葡萄牙商行總經理任命的“澳門總督”主持。澳門成了

一片風水寶地，它從某些歐洲的船上卸下來由議事局向居民們大宗出售的商品徵收的稅款來維持。那裡有一個擁有廣泛權力的主教。當地居民與印度、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交趾支那、馬六甲海峽和法國島從事貿易。這種貿易共動用 20-25 艘船。每年有一艘船赴果阿、另一艘赴帝汶、有 1-2 艘赴孟加拉、同樣多的船舶赴馬尼拉、3-4 艘船赴交趾支那。這種情況與 1560-1630 年間赴日本旅行的時代相比，則顯得黯然失色了。澳門居民的最大宗收入來自他們向屬於不同公司的歐洲人出租其房屋或充當僕人。葡萄牙女王將經營巴西煙草的專營權留給了自己，而巴西煙末也正是中國人吸用的那種煙絲，女王在那裡有一個倉庫和一個負責銷售的代理商。每年都有 1-2 艘里斯本的船前往中國採購茶葉、南京土布、瓷器和藥材等商品，他們都用皮阿斯特支付。歐洲的葡萄牙政府長時間地忽略甚至完全忘記了一片使它未付出任何代價的殖民地。這片殖民地對它一無所求，而葡政府於數年前就派遣了一名高級行政官吏，或者是一位具有廣泛權力和任期五年的大使，他同時也是海關關長，負責死者遺留下的財產，為政治事務而與中國政府交涉。總之，他是負責全部民事與法律事務的長官。但他也在澳門從事鴉片交易，而中國政府本來是禁止這種毒品進口的。此處的鴉片大部分都被當地居民消費了，它在澳門獲得了一個可靠的集散地，又通過走私而被輸往中國內地。

澳葡政府對該半島上的中國人沒有任何司法管轄權，那裡中國人的數目多達三萬有餘，他們對其他居民行使權力。當葡萄牙人彼此之間產生某種糾紛時，尤其是當情況非常嚴重時，就必須與“廣南府”屬下的縣丞協商，縣丞駐驛於前山寨（Casabranca）。那裡過去曾有一家設備精良的鑄炮與鑄鐘工廠，用自日本進口的銅供應原料，於 1761 年由波加洛（M. T. Bocarro）創建，當時為遠東最著名的鑄炮廠。該城居民中約有 700 名基督徒，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女子，均為中國人血統。另據估計，澳門於 1745 年的信教居民為 5,212 人，包括前往澳門住冬的外國公司經紀人、亞洲非中國人的受歸化

教徒；在澳門的8,000名中國人中，約有4,000名教民。這樣算來，在18世紀中期，澳門共有9,000名基督徒，而該地的總人口要高於13,000人。葡萄牙人將收買中國嬰兒以使他們在基督教會中成長視為一種“功德業”。嬰兒的價格並不高，尤其是在中國內地各省出現荒年饑饉時更是如此。葡人更喜歡收買女童，以供應色情業。當時在澳門祇有一個歐洲女子，即總督夫人。澳門的葡籍居民實際上來自許多民族和各種膚色的人，其中包括1,500-2,000名黑人女奴。各種工匠都是中國人。葡萄牙人更喜歡祈求施捨而不是去工作。

澳門是於嘉靖年間的1557年，作為感謝葡萄牙人幫助消滅海盜張西老（Tchang-si-lao）的交換條件而允許葡萄牙人居住在該地的。這是未曾由中國史料否認或確認過的傳統說法。但無論如何，這一切在最早期，純屬地方當局與廣東官吏們的安排，而並非北京政府的一種正式割讓。因為當時海盜正在騷擾屯門地區。中國人也祇允許葡人建造木屋，但葡人善於賄賂負責此類工程進行視察的官吏們，不久便在那裡如同現在一樣定居了。他們與中國政府談判，並由此而獲准擁有一處軍事工事、一定數目的大炮和一個百名兵卒的兵營。葡人每年向中國政府交納100兩白銀（750鎊），廣南府每年都遣人來澳門隆重地接受納貢、視察工事和軍事，查詢是否嚴格遵守了條約。澳門港很安全，可以接受吃水量為20法呎的船舶。葡人很少對該港給予關注，從而使大船很快就無法使用它了，使許多船被迫拋錨氹仔島，那裡距澳門城有1法里之遠，也是安全港。中國政府保留了出自內地的關稅，並且對不屬於澳門的葡船徵收停泊稅。

當時在澳門流行的習慣是，先到達的歐洲夷館成員為後到者舉行晚宴。這都是一些盛大歡慶的日子。在1780年時，人們都穿鑲上華麗飾帶的服裝，腰側佩刀劍，乘坐由葡萄牙黑奴抬的轎子。禮儀要求在餐桌上有一隻幾乎是完整的烤全羊，每隻羊價值15皮阿斯特，這是當時最珍貴的菜餚。人們在下午2時用餐，大量酗酒，然後便去休息，晚上再返回打牌，9時再進餐，一般都要持續到次日清晨。當新

來者安居下來後，一般還要再舉行答謝宴會。因此，澳門在日復一日地和永無休止地舉行宴會。

歐洲人於每年2-10月間在澳門度過，包括十五、六名英國人、同樣數目的荷蘭人、三名瑞典人、三名丹麥人、三名法國人，三名奧地利人，此外還有幾名獨立於夷館之外的英法僑民。這些外國僑民於澳門居住期間，無所事事，除在海上遊蕩消磨時光外，再無它事可幹。這就是為甚麼大部分青年人都過着放蕩的生活，不遵守任何法紀，不從事文化活動，祇追求粗俗的享受，至少是非常懶惰。當地人往往認為那些返回歐洲的人，都是已經暴富的鉅賈，都是希奇古怪令人無法忍受的野蠻人（東哥特人）。這種情況後來略有好轉。

1780年，有幾位歐洲夫人常年在澳門居住。中國政府不允許任何非中國的女子到廣州並在那裡居住，就如同禁止任何歐洲人與中國女子交往一樣。

貢斯當對澳門的記述很詳細，而且大多可以通過其它資料而得到證實。

法國外交官拉否例有關 〈中法黃埔條約〉簽訂前後的記述

繼英國與中國政府簽訂〈南京條約〉（1842）和美國與中國簽訂〈望廈條約〉（1844）之後，法國政府也派出了由公使拉萼尼（Théodose de Lagrée, 1800-1862）率領的一個使團，在1843-1844年之間與中國談判一項航海和貿易條約。法國財商部的官員拉否例（Charles Hubert Lavolée）隨團到達中國。他們與兩廣總督耆英在澳門舉行談判，最終於1844年簽訂了〈中法黃埔條約〉。拉否例本人是鐵路專家，他1843-1846年來華的《中國遊記》於1852年在巴黎出版。此外他還發表了一部《當代中國研究》（1860）。下面是他在《中國遊記》中有關耆英與拉萼尼在澳門首次會談的記載。

1843年10月11日星期二，大清國大皇帝欽差大臣耆英與法國公使拉萼尼舉行首次會談。耆英首先送去了拜帖，於兩、三天之前將其畫像送給了拉萼尼公使。法國代表團的所有成員，包括以法國水師

總兵士思利（Cécile）為首的水師全體軍官，從中午起便在公使駐地列隊集合，耆英應在午後1時到達那裡。中國外交官們非常守時，在下午1時左右，便聽到了宣佈大隊人馬到來的鑼鼓聲。

澳門的那條主要街道上擠滿了人群。葡萄牙人和中國人都聚集在中國皇帝欽差經過的道路上。在不到三個月期間，澳門小城有幸兩次於其城內接待了兩廣總督，也就是一個在中國皇帝身邊舉足輕重的政要。耆英是中國與英國〈南京條約〉的談判者，也是在澳門與美國人簽訂的〈望廈條約〉的談判人。他開創了天朝政府對待“夷人”的一種新政策，作為政治家和外交家，而享有最高的威望，其名字與近兩年來最大的政治動亂都牽涉在一起了，從而也介入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事件。

耆英的儀仗隊並不很莊重，前面由一列兵勇開路，顯得雜亂無序。他們有的以梭標為武器，其他人則手持長矛，均以粗劣鋼鐵打造而成，使人不禁聯想到了法國衛士們的戟，祇有少數人帶有長火銃。衛隊的服裝普遍為紅衣白邊，肮髒而破舊。他們手執竹編盾牌，上面畫有滑稽可笑的圖案。兵勇隊伍中有幾名勉強穿着一點衣服的苦力，扛着小小的旗幟和告牌，命令在總督經過的大街上保持肅靜。再後面是五、六名穿紅衣和戴一種金屬網式帽子的劊子手。最後是乘轎子而來的皇帝欽差及其四位助手：黃恩彤、趙長齡、銅麟和潘仕成。所有這一切更像一場化裝舞會，而不像是總督的儀仗隊。耆英的轎子停在法國公使住宅的大門前，衙役們排列起來，似乎形成了一道籬笆牆。一陣鑼鼓聲之後，欽差及其四名同僚立即下轎。他們首先受到法國公使團一等秘書的接待，拉萼尼先生身穿官服，於樓梯之上迎接他們。中國官吏並不依禮儀而趁機展示他們的豪華服裝，此時祇穿黑色長袍。這到底是他們希望在第一次會見時作出友好表示呢？還是對“夷人”的一種鄙視呢？法國外交官們對此百思而不得其解。

耆英被領進客廳，法國使團的人都站在那裡恭候。他在公使與水師總兵之間的長沙發上就座。他們那些帶扇子、煙袋、文房四寶的僕人，也都繼其

主人之後魚貫而入，然後又不拘禮節地佔據了隔壁的房間。耆英對此不聞不問，任憑他們恣意行動。在耆英、法國公使和水師總兵之間，共持續了近半個小時的談話，由領事館的譯官加略利（Callery，《太平天國起義》一書的作者）充當翻譯。他們雙方禮節性地詢問了中國皇帝與法國國王的最新消息，然後便交談有關將法國與中國之間的距離、歐洲的疆域和有關地理的籠統看法。

耆英非常高興地看到其畫像掛在客廳的牆上。拉萼尼先生向他指點路易·菲利普國王的畫像，中國官吏們畢恭畢敬地注視它。拉萼尼又將賓客領到了隔壁一間專為此而闢成陳列室的房間，那裡陳列着貴重物品，特別是塞夫勒的一套瓷器和一艘用提花絲綢製成的船模。儘管中國以其製造的絲綢和瓷器名聲遠播海外，但在澳門的商店裡卻沒有任何可與里昂和塞夫勒產品相媲美的代表作。耆英滿不在乎地看着這些法國產品，其同僚們也採取同樣的態度，僅僅作出某種讚同而不是贊賞的表示。他們既可能是確實喜歡中國大瓷缸上那些滑稽的圖案，也可能是想公開承認一種外國工業的先進水平。

參觀了展覽之後，法方便送上了便餐。五位中國官吏和法國使團的部分成員前往餐廳用膳。中國人對於法國的菜餚與湯，都感到不知所措，也不善於使用刀叉，最後乾脆用手指抓飯吃。他們特別喜歡法國的甜點和葡萄酒。宴會上推杯換盞，陣陣喧鬧，甚至連翻譯都不用了。耆英高舉酒杯一飲而盡。在用餐期間，中國官吏們欣賞西方的傢俱、裝飾品、繪畫、瓷器。他們的僕人們的表情卻與官吏們完全不同。負責給耆英裝煙斗的僕人，大搖大擺地坐在沙發上，也認為沙發比總督府的木椅或籐椅舒適得多，甚至如同淘氣兒童一般地逐個沙發試坐。官吏們也酷愛西洋大玻璃鏡，並且利用它來整冠端帶並盡情地自我欣賞。衛隊中的軍官們也很不好意思地將他們的短劍與自己的軍刀相比較。總之，這些僕人和軍官都比總督及其同僚們更坦率地承認西方文化和工業的先進程度。耆英在離席之前擁抱了公使。堅冰已經打破，中法兩個民族的友好交往從此開始了。

法國外交官斐列勒有關兩廣總督耆英 在澳門招待法國拉萼尼使團 和中法〈黃埔條約〉簽字儀式的記載

法國外交官斐列勒（Théophile de Ferrière Le Vayer, 1812-1864）是法國 1845 年出使中國的拉萼尼使團的一等秘書。他於 1843 年 12 月離法赴華，於 1845 年返法。數月之後，他再度出發赴澳門，於次年終返回法國。其出使報告《赴中國的一個法國使團》於 1854 年在巴黎阿米奧（Amiot）書店出版。他於其書中介紹了兩廣總督對法國公使的招待。正是耆英與拉萼尼在澳門的這幾次會談，才導致 1844 年 10 月 24 日在珠江黃埔島附近停泊的法國阿吉默特（L'Archimède）號火輪兵船上簽訂了中法之間的第一項不平等條約中法〈黃埔條約〉，即〈五口貿易章程〉。

當宣佈晚餐備齊時，耆英起身並帶領拉萼尼進入宴會廳。賓主都被一種神仙般的場面震驚了。其裝飾與佈置，酷似《一千零一夜》中的景象。八張小桌子排成半圓形，分別由耆英、黃恩彤、加略利、拉萼尼、水師總兵士思利和斐列勒佔據。兩名使節（拉萼尼和士思利）並列入座，其他六名客人則坐在另外兩張桌子之前，從而使每個人都如同在劇場中演戲一般，面向大眾。菜盤之上覆蓋着一塊絲綢。菜餚是按日常習慣上桌的。開胃菜餚有酸甜點心、湯、紅燒肉和魚、魚翅、扇貝、中國酒。飯菜非常豐盛。黃恩彤贊揚斐列勒用餐的姿態和方式，是地道中國式的。

這頓主餚是烤乳豬，它足可以使巴黎的廚師們感到自愧不如。其後還有幾道烤肉。中國烹飪術是其文明中最精彩的強項，它集古今社會習俗和庖廚程式為一身。中國宴會如同俄國一樣，配有飯前開胃菜；如同英國一樣，備有加了的香料的調味品；如同法國一樣，要上烤肉和複雜的菜餚；如同在尼祿（Néron）的宴會上一樣，祇吃一頭牲畜身上很小的一部分，殺死一隻巨大的鱈魚，而祇吃其背部很少的一點魚翅。中國的烹飪術甚至祇選擇某些種類的柴薪來烹調某道菜餚。例如，清煮雞祇燃燒桑木，

烤乳豬祇用槐木，煮茶祇用松木。總督府的豪華，由此可見一斑。

飯後點心由糕點、蜜餞和糖菓組成，耆英讓客人們品嚐帶有小字的糕點：“友誼萬歲！”有一種來自北京的用擀麵團製成呈薄葉狀的韃靼餅，總督小心翼翼地把它們單獨包裝起來，以備送給拉萼尼先生的孫女。在整個晚宴期間，時不時有年輕侍從為耆英和黃恩彤遞送小毛巾，以便讓他們拭手和抹臉。

當客人離席時，時間已經很晚了。人們在客廳裡喝茶之後，互道晚安。法國使團成員徒步返回澳下榻處。這是耆英對拉萼尼此前宴請他的答謝宴。中國人在宴會上布菜給法國女賓，耆英當着女賓的面抽煙。拉萼尼對如此失禮很惱火。加略利先生向中國欽差陳述應如何禮待女眷，不要在使節面前抽煙。耆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使他幾乎因失態而不知所措。

10 月 24 日早 6 時，炮臺的炮聲宣佈，兩廣總督正向澳門趕來。在澳門碼頭，已經支起了一頂帳篷；在海濱聚集了許多人，準備領略中國皇帝欽差及其侍從們的豐采。法國阿吉默特火輪兵船企圖盡快駛去，但由於水淺而無法靠岸。中華帝國的旗幟高懸在法國國旗旁邊的高杆上。幾隻尾部掛着法國旗幟的船舶，也於總督帳篷附近停泊。中法〈黃埔條約〉要在廣州河上的黃埔島附近的小型護衛艦上簽訂。

法國人早於中國總督幾分鐘到達現場，船長帕里斯（Páris）僅以兵器與旗幟莊嚴地裝飾其艦艇，顯得一派風光非常優美迷人。旗幟於艦艇的後部交織點綴着分成兩個小艙的一頂帳篷。第一間小船艙用於接待中國兩廣總督耆英的侍從、衛隊、漢族和韃靼族的僕人。兩門新型的小銅炮鍍光油亮，在需要登陸時則要放在小車輪上，置於中間，大刀、長矛與火槍架於四周。第二間小船艙供總督和拉萼尼使用。鋼鐵光芒是臨時用刺刀造成的，用旗幟覆蓋的子彈箱充作招待來客的沙發。幾把椅子和一張桌子是僅有的非出自武器庫中的用品。船上用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國旗搭成的帷幔，封閉了大部分通道，惟有後通道例外，那裡成了觀察附近島嶼和海洋的窗口。

法國水兵總領和拉萼尼請前來簽訂〈黃埔條約〉的中國欽差大人坐在他們兩人之間，欽差大人對於

他所看到的一切都顯得極其高興。黃恩彤、潘仕成和趙長齡也各自於“沙發”上就座，阿吉默特號火輪兵船啟錨向大海駛去。

當時正遇上逆風，而且風力變得越來越強勁。火輪兵船困難地在珠江口的島嶼之間航行。眾人在大船上也祇能緩慢地步行。中國人飲茶、睡午覺和參觀法國製造的非常漂亮的機器。耆英走走停停並津津樂道地注目欣賞那些機械。他親自發射了一枚榴散彈炮，並以一個軍人的好奇心注視着炮彈在海面波浪上跳動。這一種消遣方式並不符合黃恩彤的興趣，他返回船艙去翻閱一本木刻版畫，讓那名老韃靼人親自去視察大炮。他們在一段時間內也玩達格雷照相機，這是法國人為了給簽字儀式的參與者照相才帶來的。非常不幸，由於小船上的搖擺和大風在天空吹來的烏雲，對照相感光效果嚴重有損，但他們還是留下了一些清晰可辨的紀念照片。中國人對此感到非常驚奇，靜靜地讓洋人作出各種擺佈，以取得最佳效果。總督的額頭有時也掠過一絲憂鬱的陰影，可能是暈浪、厭煩，也可能是關心北京方面對將要讓步的想法。每種假設都是有根據的，也可能是那三種不幸集於一身了。他即興吟哦一首四言詩，神情憂慮地承認中國的衰弱和西方民族無法戰勝的力量。其大意是：“你們如同狂獅地入侵我國。我如同膽怯羔羊，腳踏你們的強大機器，感到不知所措而迷茫。”

他們一行於5時許到達虎門。在黃埔江入海口那含鹽量很高的水中，漂動在矗立的兩座大山的夾縫中。峽谷每側都有炮臺，控制在中國軍隊手中的大炮可以消滅任何假想中的船隊。但一艘英國快速護衛艦阿爾切斯特號（Alceste）於1816年在其炮火下通過虎門，卻未損失一兵一卒。在最近的一次戰爭中，虎門的城牆被海軍的炮彈炸燬。自從恢復和平之後，中國政府僅重建了圍牆，其長長的白色垂花飾非常優雅地裝飾着山崖的正壁，但它卻沒有任何令人望而生畏的外表。人們謔稱它是卡通城牆，而且還由稚童們配上木偶守兵。他們沒有任何堡壘，其大炮很輕，以至於放兩炮便會把它們推倒在地。

他們一行人在激流中緩慢地前進。不斷地有戰船駛往他們面前，並以三聲禮炮歡迎總督的旗幟。那些兵勇們在橋頭列隊，身穿迷彩衣，肩扛矛槍，敲鑼打鼓，桅杆頂上飄揚着綵旗，熱鬧而又喧囂。

傍晚時，分佈在山頭炮臺上的大炮連續發射，在黑暗的夜空中劃出一道道火光。掛在城牆上的紅燈籠顯得如同一團團通紅的火球。五彩繽紛的煙火騰空而起，充分證明了中華帝國在花炮製造方面的先進技術。法國人卻以其小型護衛艦而感到自豪，就在發射的炮火中渡過了炮臺。

他們一行最終望到了黃埔島的高坡。人們在海軍總領的小客廳裡準備了一張桌子。中法《五口貿易章程》（即中法〈黃埔條約〉）共準備好一式四份，分別用中、法文本書寫，放在桌面的一塊綠色墊毯之上。

黃恩彤拿着應呈送去北京的那兩份，斐列勒手捧了應呈送去巴黎批准的兩份，然後兩人又分別交給耆英和拉萼尼。耆英於每份文本的下部蓋上了皇帝欽差那帶黃金冠冕圖案的大印，並且使用毛筆簽名。然後他將條約文本交給法國特命全權大使拉萼尼。拉萼尼按照法國方式蓋上蠟印。拉萼尼對斐列勒呈交給他的那幾份也用同樣手法簽署。當條約的簽字儀式結束時，耆英又將準備呈送皇帝的那兩份文本轉給了黃恩彤。拉萼尼也將需要法國國王批准的那兩份交給了斐列勒。後來，兩位特命全權代表又情感傾瀉地擁抱。斐列勒先後擁抱了黃恩彤、潘仕成和趙長齡。所有人又都登橋上了由海軍總領帕里先生臨時修建起來的艙樓甲板上，以雞尾酒香檳來慶祝簽字儀式的結束。

桌子上放滿了玻璃杯，杯中斟滿了香檳酒。海軍總領為兩個國家的團結而乾杯。耆英滿懷激情莊重地作答。在出現這個小小場面期間，他們到達了這次航行的終點。火輪拋錨之後，又有一艘燈火輝煌並由數隻小船牽引的帆船，駛近他們的小型護衛艦。鑼鼓聲、音樂聲、大炮聲、花炮的爆炸聲、衝向船舶來看表演的民眾們的喊叫聲，與在風浪中搖曳並以千道光芒照射的燈籠之碰擦聲，互相交織為一體。總督攜同黃恩彤、潘仕成、趙長齡與法國人告別，然後走下艙樓甲板登進他們自己的帆船。帆

船上有一個金碧輝煌的大廳，以金器和繪畫裝飾，如同一座沉浸在節日氣氛中的宮殿一樣。阿吉默特號火輪以三聲炮響慶祝自己的啟航，大炮那發光的煙霧在一段時間內照亮了船頂上飄揚的旗幟。

奧古斯特·奧斯曼對澳門的記述

奧古斯特·奧斯曼（Auguste Haussmann, 1815-?）是法國政府官吏。他作為法國外貿部的代表，於1843-1844年赴陪同華的拉萼尼使團。歸國之後，1847-1848年他在巴黎發表了入華調查成果，即三卷本的《中國、交趾支那、印度和馬來亞遊記》。這是一部研究中國貿易出口的指南性著作。他於1864年還出版了一本有關太平天國起義的著作。在他的中國遊記之中，除了澳門和廣州之外，還描述了中國鴉片戰爭之後被迫對外開放的幾個港口：定海（舟山）、寧波、上海和廈門等。下面簡單敘述一下他有關澳門港的記載。

澳門半島風景非常優美。從拋錨地一眼望去，全城顯得如同一個大階梯劇場。在驚訝地瞪大雙眼的旅行家面前，出現了一片華麗的房舍，其窗戶和廊柱沿漂亮的大海灘（Praia-Grande）也就是南灣港排成了對稱的幾行列，產生了一種令人賞心悅目的效果。初入南灣，便會給人留下難以忘懷的印象。

澳門半島山嶺環繞。在山頂上建起了多座炮臺，主要炮臺有媽閣炮臺（Barra），位於該半島的最高處，面對猴島，它控制了進入內港的支流；另外一座是位於該城西北端的聖保祿山炮臺（Fortaleza de Saint-Juan del Monte）；另一處為伽思蘭炮臺（San Francisco），其下豎立着同名教堂。最後才到達一片大海灘（南灣），那是一個半圓形的寬敞碼頭，長達1公里以上；最後是東望洋炮臺（Guia），建在一座比其他任何炮臺都更遠和更高的山坡上，一堵從伽思蘭炮臺開始的築有雉堞的城牆，到那裡結束，它是過去由荷蘭戰俘們建築的。從炮臺上可以欣賞到一幅美麗的圖畫，從那些帶有白色城牆和寬敞建築物的山坡上，可以看到葡萄牙旗幟迎風飄揚，令人贊不絕口地環繞全城。澳門共

分為界限明確的兩部分，即葡人城和華人城。葡人城幾乎全部面對海灣，乾淨且建築技術高超，擁有相當數量的豪華屋宇。在那裡可以看到多座教堂，主要有：聖若瑟堂（Saint Joseph）、聖安東尼堂（Saint-Antoine）、聖方濟各堂（Saint-François）、仁慈堂（La Miséricorde）、主教座堂（Cathédrale）。澳門議事會設於一座位於一個三角形廣場深處的大樓上。澳門最美的街區幾乎是人煙稀少之地，大家可以在那裡看到漂亮的房子由花園簇擁，其寂寞已使人難以忍受。街道幾乎全部是坡形的。從高高的圍牆中可以遙望到幾棵大樹的樹梢，其樹冠一直垂到圍牆之外。在華人城中，有一座官邸，以兩根大旗杆為標誌。附近有一個龐大的市場，內分為蔬菜、魚、肉各一廳。有數條狹窄、骯髒和喧鬧的街道，與葡人城的安寧、乾淨和清靜形成了鮮明對照。

在與大海灘（南灣）相反的城市一側，面對內港處，有一個蛤蟆灘（Praia-Manduco，下環街）。因為那裡有一片岩石，呈爬行動物狀。據中國人認為，它在海水退潮時升起，在漲潮時下降。這一切都自然地被理解，而無須承認石頭的方位會發生任何變化。海關大倉庫位於內港大碼頭，大部分房子均建在海岸上。海岸外就是船舶停泊處，其中有許多中國小船。

在距聖一安東尼教堂不遠的地方，便是在澳門任葡語翻譯的馬吉士（Marquez）先生的府邸。人們還在那裡拜謁賈梅士（Camoëns）巖洞（今白鴿巢花園）。葡萄牙大詩人賈梅士從里斯本先後被流放至果阿諸地，前來此處最後完成其史詩《葡國魂》（又譯《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人們所說的賈梅士巖洞，僅僅是一個帶兩個進口的拱穹，其下面有一個支撐詩人半身塑像的紀念碑。碑面上刻有由賈梅士寫的數行詩，同時還刻上詩人的生卒年代。在一塊方板上，可以讀到近一打法文雙腳詩，是由路易·德·里昂齊（Louis de Rienzi）於1829年令人雕刻的。拱門之上有一個小丘，人們可以通過階梯攀援上去。小丘上有一個小方亭子，牆壁上刻滿了文字、人名和時間等塗鴉之作。

澳門居民是由四、五萬中國人、五、六千名誕生於亞洲的白人、混血兒和黑人組成。其中也有相當數量的出自葡萄牙在印度殖民地的奴婢。最後是英國人、美國、巴斯人（Parsis）和六十多個誕生於歐洲的葡萄牙人。真正的澳門土人是葡萄牙人、中國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的混血兒，混合性和差異性很大。他們於今天形成一個單獨的階層，其突出之處是體形接近於中國人，特別是接近於日本人。人們可以通過其下寬上尖的頭顱、扁平的鼻子、寬大的嘴唇、長長的牙齒、碩大的嘴巴、小小的眼睛、黃色或棕色皮膚、黑色和濃厚的頭髮辨認出他們來。他們既不太胖，也不太瘦。男女都是：同樣的膚色、同樣的線條、不太優雅的身材、拘束的舉止、樸素的衣着。澳門女子身披巨大的印度披肩（紗麗），從頭頂一直垂到腳跟，祇讓人看到一小塊黃色的面龐、鼻子和嘴巴。這是女子在城內行走時必備的衣裝。安達盧西亞女子式的頭巾越顯得漂亮，葡萄牙女子式的風帽就越顯得寒儉。

葡萄牙居民、白人以及混血人極其懶散，保持着一大堆最奇怪的成見。那些赤貧的大部分人（其世系之中分別具有中國人、印度人和馬來人的分支），仍以其家庭的介詞 de 等自豪，這類介詞始終附於其名字中，而將那些非婚生的兄弟們視為被征服民族。他們更喜歡拖延這種淒慘的生活，盡可能地掩飾其貧困狀態，而無損於其所謂的高貴身份，不肯放棄他們自認為是由其出身造成的習俗。當澳門葡人悲慘地生活在昔日的榮耀中時，中國人卻佔有了能賺錢的所有職業，並且與葡人結合在一起，學習其語言，卻又從不失去自己的民族性，而且日益傾向於吞併歐洲的殘餘勢力。

澳門的貧窮是令人慘不忍睹的。人們每走一步，都會遇到發出陣陣呻吟聲的乞丐。他們採取極端低三下四的姿態，以前額撞擊地面，再向行人出示其傷口，以便乞討。女子們又以怨歌、號哭和啜泣配合其乞討行為。這些苦人兒衣衫破爛，許多人居住在遣使會的麻瘋病醫院中，那裡集中了人類的所有苦難。

大海灘（南灣）的三個碼頭成了大批中國女蛋民的大本營，這些女船民被稱為 tankas（蛋家）。所有從澳門乘大船出發或到達該泊口的旅客，都必須在距碼頭有一定距離的月臺上拋錨停泊，會受到蛋家們的歡呼，後者並且像猛禽一樣地撲向來客，同時又高呼：“我的船！我的船！船長！”（My boat, my boat, captain!）。人們在一片嘈雜聲中祇能辨認出這幾個音節來。她們在爭奪到港旅客的行李將之運上碼頭之後，便開始索取小費。此外，這些蛋家們都是很漂亮的少女，人們沒有勇氣向她們發洩忿怒之情，尤其當大家瞭解到她們的悲慘生活，特別是當獲悉她們需要供養自己及全家人時，更不會遷怒於她們了。那些長度最多不過三米的小船，是她們一年四季日夜間惟一的棲身之所。這些船民的先祖係自臺灣遷來，過去曾從中國政府獲得在包括澳門在內的廣東沿海居住的許諾，但絕不允許她們上岸定居。她們在船上有一張折疊椅、一個小火爐、一張簡陋的床、淡水、爐火和很少一點食物。小船的後艙用一張草蓆拱頂遮蔽風雨吹打和日曬。其前艙有一名以槳武裝的女船伕；另一端是一名女舵手，操縱着一種劃槳式的舵，如同一條魚尾。蛋家們經常背負一點可憐的食物，這是其全家特別是其母親的食物。她們的服裝就如同其生活一樣光怪陸離。她們頭上經常包着一塊深色頭巾，戴着風笠，祇能使人看到她們那黃色和紫銅色的部分面龐。這些女子們身穿一種藍色、寬袖和短襟的上衣，從脖子一直覆蓋到膝蓋。肥大而又色彩深沉的褲子一直垂到腳踝骨。她們始終打赤腳。蛋家們也裸露胳膊，喜歡佩帶白銀或玉質的手鐲。

這種女子的類型往往是中國人、葡萄牙人和馬來人的混血兒，這與她們輕薄的生活有關。她們的粗獷性格，與其他中國女子那種持重、恬靜和靦腆的外表完全相反。

通過上文介紹，我們可以看到，17-19世紀西人對澳門和廣州的記述相當詳盡，面面俱到，文筆細膩。它們可以補中國史書記述之不足，對深入研究這個時代與這些地區的歷史頗有裨益，值得一讀。